

1900年10月，普鲁斯特家搬到了古尔塞尔街45号，在三楼住了六年多，直至1906年12月。那是一个宽敞而富丽的豪华套间，但他所有的幸福都随风而逝。先是他的弟弟结婚后搬走；而后1903年11月、1905年9月，他父母相继病故，让他痛不欲生。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现在只剩了他一个人。但他继续住在父母去世的套间里，又住了一年多，等待租约到期（只不过最后几个月，即从1906年夏到年底，可能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住到了凡尔赛的水库旅馆）。现在的古尔塞尔街45号，什么纪念铭牌都没有，但要找到那里并不难，它就在

“巴黎子”普鲁斯特

邵毅平

经过凡尔赛心灵至暗的几个月，1906年12月26日，他搬入了奥斯曼大街102号，在那一直住到1919年6月。那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住所，因为《追忆》的绝大部分写于那里。奥斯曼大街当时也算是巴黎的“高尚”地段，在《追忆》里，“我”的姑祖母嘲笑斯万的理由之一，就是斯

有机会到西安出差，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。当我打电话告诉父母时，他们也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办完公事，我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开往县城的长途汽车。

父母又显老了，我心头掠过一丝的酸楚和无奈。一顿时报喜不报忧的汇报之后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老屋。老屋离父母现在生活的县城只有七八里地，十几年前我们全家“农转非”到了县城，吃上了商品粮，羡慕死了村里的母亲说老屋的房子还好，两棵老山楂树的果实多得都要把树压坏了，一定让我多摘些带给同事们。于是我和母亲去了让我魂牵梦绕的老屋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记忆中的老屋是快乐的源泉，是简陋的，又是丰富的，我在其中度过了快乐美丽的童年。每每想起老屋，我心头不禁会充满幸福的感觉。站在老屋里，人似乎穿越到了一张旧照片中，满目所及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而又亲切，一切仿佛就在昨日：一本当时我攒钱买的小人书，书名叫《警犬黑豹》，我记得是小学二年级的冬天和小伙伴们一起逛县城古庙会时买的，花了我一毛二分钱，而我当时只有二三毛钱，我自己又吃了一碗豆腐脑，剩下的几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个泥塑的口哨，他本来就哭着要和我们一起去的。还有一把我亲手制作的木头手枪，一顶当时流行的小八路的帽子，这两样东西当时支撑着我在村里和玩伴们喊叫厮杀；一张还贴在墙上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，那是我在小学四年级获得的……举目所及都触动了记忆的深处，我仿佛又听到了自己

快乐的笑声，一切又回到了三十年前，那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幸福呀，只是当年的小主人公已是不惑之年了。听着母亲不紧不慢自言自语式地解说，泪花已悄悄地涌上了我的眼角。

母亲突然像发现了宝贝，让我快来看。那是一只满身灰尘的半导体收音机，随着岁月的灰尘被逐渐剥去，我的记忆也一层一层地被唤醒。一台北京无线电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产的“牡丹”牌半导体收音机。外形庄重，清黑而华贵，正面镶嵌一朵精美的金属牡丹花，其后附着一行文字：牡丹5410型半导体管收音机。背面则用中英文写着：中国北京无线电厂制造。它是我家当时唯一的电器，比我的年龄还大，是父亲早年在北京工作时买的。当时父亲是北京市建筑工人医院的医生，而我和母亲却在农村老家，去不了北京，于是父亲便从人都向往的首都调回老家县城的医院。这个收音机就是父亲当年带回为数不多的家当之一。从此它便成了我最好的伙伴，从中央台的“小喇叭开始广播了”到评书岳家将、隋唐演义等，它带给我无穷的快乐回忆。后来我不小心将收音机从高处摔下，后盖掉了下来，碎了一小块，塑料制的螺丝也被摔坏了，致使后盖不能被固定，而当时根本不可能配一个新的。母亲痛斥了我后，用一根松紧带将前后盖绑在一起，如今十几年不用了。

离开了老屋，我从梦里醒来。父亲给收音机重新装上了电池，除了时而有些接触不良外，其声音竟然清晰依旧。获得了父母的许可，我把它带回了上海，想要永远留住老屋和我快乐的童年。

在蒙梭街的拐角，斜对面的古尔塞尔街48号，原址是布莱顿旅馆，狄更斯住过几个月，1926年改造为著名的巴黎红楼，是华裔古董商卢芹斋的公馆。

万本有能力在奥斯曼大街或歌剧院大街弄一套住宅，却偏偏有失身份地住在了圣路易岛上的奥尔良滨河街。姑祖母嘲笑斯万说，大概是为了去里昂不至于误了火车钟点（里昂距离圣路易岛不远，姑祖母的话是一语双关）。

奥斯曼大街102号原先属于普氏的外叔公，1896年外叔公在那儿去世后，由普氏的母亲和舅舅共同继承。等到普氏的母亲和舅舅也去世，由普氏兄弟和其舅妈共同继承。普氏在舅妈艾米莉·韦伊的蛊惑下，把自己的那部分产权卖给了舅妈，从共同的业主变成了舅妈的房客。不过普氏其实并不喜欢那里，在写给德·卡亚维夫人的信里，他抱怨“这套公寓丑陋难看，满是灰尘，还有窗外那些树，都是我讨厌的”，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他妈妈从未住过那儿。1918年11月，他舅妈没有事先通知他，就把房子卖给了瓦兰·贝尼埃银行。翌年6月，银行决定让房客全部搬走，导致普氏接下来居无定所。入住那里的银行几经转换，江河日下，现在那家银行根本不让参观了。

经过几个月的寄人篱下，1919年10月，普氏搬到了阿姆兰街44号。那儿离集美博物馆不远，成为他最后三年的住处，既简陋又不舒适，租金却极其昂贵。“他割断了最后的缆绳”，只为了自己的作品而活着，做了自己作品的殉道者。他在那里完成了《追忆》，1922年11月18日去世。那里现在是爱丽舍联合旅馆。那天我参观完集美博物馆，找到了爱丽舍联合旅馆，跟领班磨了许久嘴皮子，却还是没能上五楼去看看。

“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，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。”如果普鲁斯特的故居可以分属于这两句话，那么马尔泽尔布大街9号、古尔塞尔街45号就属于前一句，奥斯曼大街102号、阿姆兰街44号则属于后一句。在普鲁斯特故居的场合，时间同样可以变形为空间，可以看见，可以触摸，正如《追忆》结尾表现的那样。

对于普鲁斯特来说，除了其出生地建筑已非，他的所有故居都在，然而不可思议的是，却没有一处被辟为纪念馆，像巴尔扎克、雨果们的故居那样。也就是说，在巴黎，你不可能参观到普鲁斯特故居，虽然他是一个地道

的“巴黎子”。我参观过的唯一一处普氏“故居”，是在远离巴黎的伊利耶—贡布雷，然而那是他姑妈家，而不是他自己的家。

诗四首

念奴娇·登高 李锦雄

情牵千里，素秋揽北斗，琼楼高耸。故国苍烟穷美景，一夜扶苏画梦。对酒当歌，承平日久，高启云帆颂。东风狂荡，指人间眼皆空。

昔日东亚饥夫，英雄气短，使得人人捕。天下五雷平野寇，一石掀翻山家。肩比千年，浮光掠影，自道公平送。祥云金世，祐中华永翔凤。

登上海中心大厦感怀 刘鲁宁

揽胜云间意自道，无边烟景望中收。
浦江绝好观潮处，不复当年万国楼。

新职业之快递小哥 黄俊民

骑影匆匆迅似风，递哥载货窄街冲。
三阶两步登楼上，万唤千呼与客通。
筑梦有成皆劳燕，移山不止尽愚公。
条条道路如经脉，血液新鲜机体融。

临江仙·饮食变迁 郭云财

自幼三餐掺野菜，最馋玉米馍馍。长成又盼细粮多。周周能吃肉，月月有烧鹅。
今日谁还愁米面？鸡鸭鱼肉成箩。乡村结伴看青禾。粗粮成最爱，野菜引欢歌。

普鲁斯特去世后，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，仍在塞纳河右岸。他亲爱的罗贝尔弟弟，去世后也葬在一起。一方黑色大理石墓碑，平铺在地上，朴素而又奢华，简洁而又深沉，明快而又悲伤，像极了普鲁斯特的风格。在《追忆》中“我”有一次希望，只要当了作家，“我”就可以永不离开巴黎（当时是为了希尔贝特）。他果然做到了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在巴黎，我进不了他的任何一处故居，唯一能接近他的只有这处墓地。

不过，也许普鲁斯特并不在意这些，正如《追忆》第一卷结尾所说的：“我们一度熟悉的那些地方，都是我们为方便起见，在广袤的空间中标出的一些位置。它们只不过是我们有关当年生活的无数相邻印象中的一个薄片；对某个场景的回忆，无非是对某个时刻的惋惜罢了；而那些房舍、大路、林荫道，亦如往日的

邦国的治理者是以君主为首的一个团体，必须团结一心，步调一致。这就要求每一级领导者都要端正心态，处理好各种关系。上与下，是上位者与下位者；前与后，是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的前者与后者；左与右，是平等位置的同僚。领导成员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也就是自孔子始儒家一再倡导的恕道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
显而易见，曾子讲治国平天下，首先强调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要以身作则，垂范于人。其中，突出了孝、敬、仁、恕几个方面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考察历史，一再颂扬尧舜以及文王、周公，一再贬斥桀纣，着眼点都是他们道德品行的高下。对当代各国君主的品评，抑或是面对面的谏言，说得最多的也是道德话题。
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：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信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”

“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——此谓絜矩之道。”

《大学》之“传”的最后一章讲治国平天下。原文较长，需分几次介绍，本文是第一篇。

如前所述，曾子分别讲“修身在正其心”“齐家在修其身”“治国在齐其家”，最后讲“平天下在治其国”。一步连一步，每一步都是前一步的升华和结果，同时又是后一步的基础和起点。在昨日、今日、明日的关系中，侧重点和着力点都是今日。平天下是理想，治国是现实；理想的实现须靠现实的确立，或者说，理想的苗头就在现实的行动之中。因此，在平天下的愿望中，最重要的是干好自己的事，干好当下的事。

现在看曾子如何讲解。引文第一段中，“上”与“民”相对，指邦国的统治者。“老老”，前一个老作动词，敬养之义。“长长”，音掌，前一个长字是尊重之义。“弟”，同悌，敬爱兄长曰悌，亦引申为顺从长辈、官长。“倍”，通背，违背、背弃之义。“君子”，指有德的治国者。“絜矩之道”，絜为量度，矩是画方形的工具，二者象征道德上的示范作用。

所谓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邦国，是说治国者敬养老人，民众就会兴起孝顺之风；治国者尊重年长、位高之人，民众就会兴起敬上之风；治国者怜恤孤幼，民众就会跟着做同样的事。因此，治国者要有足以让人效法的道德风范。

以下，曾子具体解释治国者要有什么样的治国言行。厌恶上司所做的，就不要那样使唤属下；厌恶属下所做的，就不要那样侍奉上司；厌恶前者所做的，就不要那样对待后者；厌恶后者所做的，就不要那样随从前者；厌恶右边的人所做的，就不要那样移交给左边的人；厌恶左边的人所做的，就不要那样移交给右边的人——这就是絜矩之道。曾子所说，是衡量言行规矩的具体方法。

邦国的治理者是以君主为首的一个团体，必须团结一心，步调一致。这就要求每一级领导者都要端正心态，处理好各种关系。上与下，是上位者与下位者；前与后，是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的前者与后者；左与右，是平等位置的同僚。领导成员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也就是自孔子始儒家一再倡导的恕道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
显而易见，曾子讲治国平天下，首先强调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要以身作则，垂范于人。其中，突出了孝、敬、仁、恕几个方面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考察历史，一再颂扬尧舜以及文王、周公，一再贬斥桀纣，着眼点都是他们道德品行的高下。对当代各国君主的品评，抑或是面对面的谏言，说得最多的也是道德话题。

岁月那般转瞬即逝。”

（纪念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第二卷《在少女们身旁》出版一百周年暨中文全译本开始出版三十周年。）



秋趣

(中国画)

屠功明



前不久在伦敦，白天忙正经事，夜晚属于自己，于是接连几晚在西区看了《汉密尔顿》和《剧院魅影》，又恰好赶上八次获得格莱美提名的美国爵士乐大师Larry Carlton来伦敦演出，好机缘不容错过，也就好好过了一把赏乐追剧的瘾。

伦敦的剧院都不算太大，装饰古朴传统，让你觉得正该是在这落叶飘飘的秋夜里，一路听着“答答的马蹄声”前往的。每个剧院常年演出一个经典剧目，却总能场场爆满，这也是让很多别的大都市徒生艳羡而又学不来的。剧院里的座位堪称紧凑，看客们一望而知来自五湖四海，开演前，各色人等在此交流碰撞，语言不通，就用肢体语言来补充，坐在一边细细观察的话，也堪称一出有趣的好戏。然而剧一旦开演了，观众席上的“群众演出”，即刻让位给聚光灯下的专业歌者，大家一起惊叹于嘻哈与历史的完美贴合，一起沉醉于惊悚与唯美的精妙穿插，

一幕幕停歇时，总会有如潮的掌声响起。台上演得带劲，台下看得有味，一切似乎都刚刚好。曲终人散时，剧场外一抹天凉，月色如水，步行穿过一条条梧桐灯影里的英伦街巷，正好细细回味一下戏里戏外的假意真情。

回到上海，意犹未尽的我也随之留意起近期有没有好的演出。恰逢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，翻看了一下剧目预告单，从大型杂技剧《战上海》到意大利喜歌剧《假扮园丁的姑娘》，从安吉拉·乔治乌到夏威斯·祖克曼，也堪称名剧荟萃、大咖云集，再加上各区主办的“艺术天空”系列演出，这一秋的上海，一样有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。

与伦敦一样，海派文化的基因里，也是蕴含着深厚的观剧传统的。前不久，恰好看到一张电子版的“虹口电影文化地图”，把地图左侧的时间轴拉回到1930年，可以看到当年的虹口以四川北路为中轴，由北至南依次坐落着明星大戏院、广东大戏院、上海大戏院、融光大戏院、虹口大戏院等，可见当时观剧风气之盛；把时间轴拨至1978年，明星大戏院变成了永安电影院，广东大戏院变成了群众影剧院，融光大戏院被国际电影院所替代，这些年，上海在文化软硬件建设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设施一流的演艺场所纷纷涌现，世界级的赛事和演出也陆续抢滩上海，身边的好戏，确实越来越多了。今年3月11日，上海交大发布了最新的《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报告》，排名前三的依次是纽约、伦敦、巴黎，北京排名第七，上海排名第九。进步显而易见，差距在哪里呢？我想，文化的养成，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浸润的，就像伦敦众多街心花园里，那一棵棵参天的梧桐树一般，无论世事变幻，它们一直就在那里，从初见时眼中的风景，慢慢演变成路过时的习惯，最终沉淀为一种传统。我们缺少文化传统吗？似乎不应该，却也似乎不那么鲜明了。什么时候，当观剧又成为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时，或许一份《评价报告》里的排名先后，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。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
身边的艺术节
《一街之隔看“热剧”》
责编：杨晓晖

观剧基因和文化地图 孙伟

出了。恰逢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，翻看了一下剧目预告单，从大型杂技剧《战上海》到意大利喜歌剧《假扮园丁的姑娘》，从安吉拉·乔治乌到夏威斯·祖克曼，也堪称名剧荟萃、大咖云集，再加上各区主办的“艺术天空”系列演出，这一秋的上海，一样有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。

与伦敦一样，海派文化的基因里，也是蕴含着深厚的观剧传统的。前不久，恰好看到一张电子版的“虹口电影文化地图”，把地图左侧的时间轴拉回到1930年，可以看到当年的虹口以四川北路为中轴，由北至南依次坐落着明星大戏院、广东大戏院、上海大戏院、融光大戏院、虹口大戏院等，可见当时观剧风气之盛；把时间轴拨至1978年，明星大戏院变成了永安电影院，广东大戏院变成了群众影剧院，融光大戏院被国际电影院所替代，这些年，上海在文化软硬件建设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设施一流的演艺场所纷纷涌现，世界级的赛事和演出也陆续抢滩上海，身边的好戏，确实越来越多了。今年3月11日，上海交大发布了最新的《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报告》，排名前三的依次是纽约、伦敦、巴黎，北京排名第七，上海排名第九。进步显而易见，差距在哪里呢？我想，文化的养成，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浸润的，就像伦敦众多街心花园里，那一棵棵参天的梧桐树一般，无论世事变幻，它们一直就在那里，从初见时眼中的风景，慢慢演变成路过时的习惯，最终沉淀为一种传统。我们缺少文化传统吗？似乎不应该，却也似乎不那么鲜明了。什么时候，当观剧又成为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时，或许一份《评价报告》里的排名先后，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。